

目的语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 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教学研究

宋云秋, 姜菲菲, 彭庆华

云南工商学院文法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4年10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2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月3日

摘 要

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和表意系统, 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中文教学难点问题。而作为“非汉字文化圈”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 其在学习汉语之前均未接触过汉字系统, 且其母语多为拼音文字,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文章通过量化和实证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模式, 探究其在汉字习得偏误, 发现其偏误集中体现在认读和书写两个方面。偏误类型包括形近字混淆、音近字误读及多音字困扰和笔画偏误、偏旁部件偏误、笔顺偏误以及结构偏误。同时, 通过访谈和跟踪观摩的质性研究范式, 从认读教学、偏旁部件教学和笔顺教学三个方面, 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教学难点。此外, 针对偏误类型和教学难点, 将其汉字习得偏误归因于: 汉字系统的复杂性、母语迁移的影响、学习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以及学习策略和方法不当, 并从汉字意识培养、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辅助工具改善以及教学策略调整四个方面提供了具体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汉字教学, 目的语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

The Error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of Students from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Yunqiu Song, Feifei Jiang, Qinghua P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unn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Oct. 22nd, 2024; accepted: Dec. 26th, 2024; published: Jan. 3rd, 2025

文章引用: 宋云秋, 姜菲菲, 彭庆华. 目的语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教学研究[J].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1): 23-34. DOI: 10.12677/ve.2025.141003

Abstract

As the writing and ideographic syst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consistently posed challenges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CLT).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are non-Sinographic World, have no prior exposure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before embarking on thei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Furthermore, the majority of these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s belong to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 which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s th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errors related to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a mixed-method research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rrors predominantly occur in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The types of errors identified include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forms, confusion between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sounds, difficulties with polyphonic characters, challenges related to strokes and radicals, incorrect stroke order, and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dditionally, throug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students from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focusing on the aspects of recognition, radicals, and stroke order. The thesis attributes these errors and teaching difficulties to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transfer, limitations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use of inappropriat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 light of the identified error types and teaching challenges, this thesis offer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se suggestions include fostering awareness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ologies, improving teaching aids, and adjusting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Keyword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Students from the Countries alo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字教学不仅是汉语教学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衡量留学生汉语学习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在留学生深入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态结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既核心又棘手的难题，“可以说，汉字难学是海内外普遍性的印象，亦被说成公认的结论”[1]，这一挑战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群体而言，显得尤为突出和复杂。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探索的深度，还是从实践应用的广度，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展现出了对汉字教学与汉字习得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深切思考。一直以来，学者们致力于通过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汉字学习的认知机制、教学策略以及文化适应性，以期构建出更为科学、高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以期帮助留学生克服汉字学习的重重障碍，实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掌握，进一步促进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推动整个汉语教学领域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

作不断深化,同时也带动了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背景下,2019年来云南工商学院招收了200余名源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基于“中文+职业”的培养目标,该批次留学生均为学历留学生,除学习汉语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外,同时兼具专业能力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的需求。然而,汉字系统相较于拼音文字系统,不仅规模宏大,字形变化多端,结构上也显得极为繁复,而其读音与所承载的意义同样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对“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而言,更是难乎其难。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到来,不仅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汉字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针对这些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学历留学生,制定有效的汉字教学策略,提高其汉字学习效率和兴趣,成为当前汉字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一直是国际中文汉字研究的主要问题,但与其他汉语本体研究相比“汉字教学和研究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薄弱环节”[2]。长期以来,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普遍存在汉字“难教”“难学”的痛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汉字特殊而复杂的书写结构,另一方面则是对汉字研究与汉字教学之间的联系,尚未形成充分深入的理解,在汉字教学中,存在“汉字只是因为读写都离不开,不得不教”[3]的观点。二十一世纪以来,尽管汉字研究和汉字教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同时得益于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几次重要汉字教学研讨会,针对国际中文汉字教学的研究呈现增长趋势,但从成果数量看,多集中于理论研究,质性研究相对有限。而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的汉字教学研究更是有限,以习得研究为主,教学研究和质性研究寥寥无几。此外,从研究结果看,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的汉字教学研究普遍集中于理论研究,关于教学模式与教学策略的研究,多数仍局限于理论框架的构建,缺乏实际的教学实验验证。因此,尽管在教学模式的构建领域研究成果颇丰,但真正能够投入实践、获得广泛推广的成熟教学模式却屈指可数。

因此,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这类极具特殊性的学生,进行汉字学习与教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势在必行。遗憾的是,无论是实证性研究还是内省式分析,其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教学实践,汉字“难教”“难学”的痛点依旧未能得到充分解决。在“中文+职业”培养模式下,云南工商学院招收了大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非汉字文化圈”学历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及经济学、工商管理、土木工程及机械制造等专业技能。基于此背景,本研究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非汉字文化圈”学历留学生及其汉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访谈和跟踪调查,探究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及教师在汉字教学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旨在为“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提供切实有效的策略建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受“一带一路倡议”倡议影响,2019年至2024年间,云南工商学院相继招收了200余名源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学历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为了深入探究其汉字教学情况,本文选取不同批次学历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115人,其中工商管理专业27人,土木工程专业留学生41人,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留学生12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留学生35人。此次调查选取的调查对象筛选依据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HSK)和《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 0025-2021)等级划分,所选调查对象均为中级阶段学历留学生,其中86人通过了HSK三级考试,29人通过了HSK四级考试。调查对象国籍包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加蓬、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其中孟加拉国31人,巴基斯坦27人,卢旺达27人,赞比亚8人,乌兹别克斯坦6人,埃塞俄比亚6人,加蓬5人,坦桑尼亚2人,斯里兰卡2人,柬埔寨1人。此次调查选取的样本覆盖了不同性别(87男,28女),调查对象中文水平等级相近,年龄分布在21~33岁之间,学习中文时间均在3~6年,选取对象覆盖面广,具有代表性。

此外,为丰富研究维度,本文选取了云南工商学院5名国际中文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留学生汉

字教学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所选样本覆盖了不同性别(2名男性,3名女性)、年龄层(27~42岁)以及从教年限(2~13年)的国际中文教师,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基于质性研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要求,本研究将在研究资料的处理上,遵循匿名的原则,对受访者的身份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将5名受访者依据受访顺序,依次标记为A老师,B老师,C老师,D老师,E老师和F老师。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课堂观摩两种研究方法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制定汉字教学各环节相关问题,以访谈形式,了解国际中文教师在留学生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以测试为主,选取历年“汉语水平考试(HSK)”真题,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 0025-2021)》,设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应用能力调查”,从形、音、义的辨识和使用及阅读、书写的综合表现两个维度,考察115名留学生汉字应用能力。

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研究结合实际教学观摩,利用摄录和照相设备,对一个行政班,共计44名留学生进行为期16周的课堂跟踪观摩,获取其汉字课堂语料。本文采用WPS图片处理软件和CS全能扫描王软件,将所获取的语料进行剪裁、锐化和拼图处理,并进行细致分析,探究其汉字习得情况。

3.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习得情况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来说,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汉字学习是一个显著的难题。受访的115名留学生均来自“非汉字文化圈”国家,在学习汉语之前均未接触过汉字系统,且其母语多为拼音文字,因此,汉字系统对其“已有图式来说是完全陌生的”[4],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学习汉字的难度。通过对调查问卷和课堂观摩语料进行分析,留学生在汉字习得偏误集中体现在认读和书写两个方面。

3.1. 汉字习得偏误情况

汉字作为汉语特有的文字符号系统,与印欧语系的字母文字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汉语书面表达与记录的唯一媒介,汉字在书面交际中发挥着核心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汉语语言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汉字作为一种典型的表意文字,其每个字符均蕴含丰富的语义信息,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法,实现了对事物、概念及情感的直观表达,这一特性显著区别于依赖音素拼合的字母文字系统。然而,在历经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后,众多原本承载着明确表意功能的汉字,已经逐渐丧失了其原始设计所蕴含的直接表意性及其原有功能,加之字形结构复杂且缺乏记音符号等因素,汉字逐渐成为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痛点”。因此,本文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应用能力调查”(以下简称“汉字应用能力调查”),对115名留学生的汉字应用能力进行了测试,测试从形、音、义的辨识和使用及阅读、书写的综合表现两个维度展开,包括字音字形辨认、音近音同汉字区分、形近汉字区分、义近汉字辨别及形义无关汉字使用等多个研究角度,测试题型涵盖了选择题、填空题和问答题三类,具体偏误量详见图1。

通过对“汉字应用能力调查”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115名留学生在测试中共出现偏误1372例,其中汉字偏误共524例,总偏误量的38.19%¹。

为进一步探究其汉字测试偏误情况,本文从字音字形辨认、音近音同汉字区分、形近汉字区分、义近汉字辨别及形义无关汉字使用五个方面,对115名留学生的偏误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具体偏误量详见图2。

通过对524例汉字偏误的计量分析发现,留学生在字音字形辨认方面存在显著问题,共出现偏误189例,占汉字总偏误量的36.07%;形义无关汉字使用所出现的偏误仅次于字音字形辨认,共计113例,

¹ 汉字偏误率计算公式如下:汉字偏误率 = 汉字偏误量/总偏误量 * 100%。偏误率保留两位小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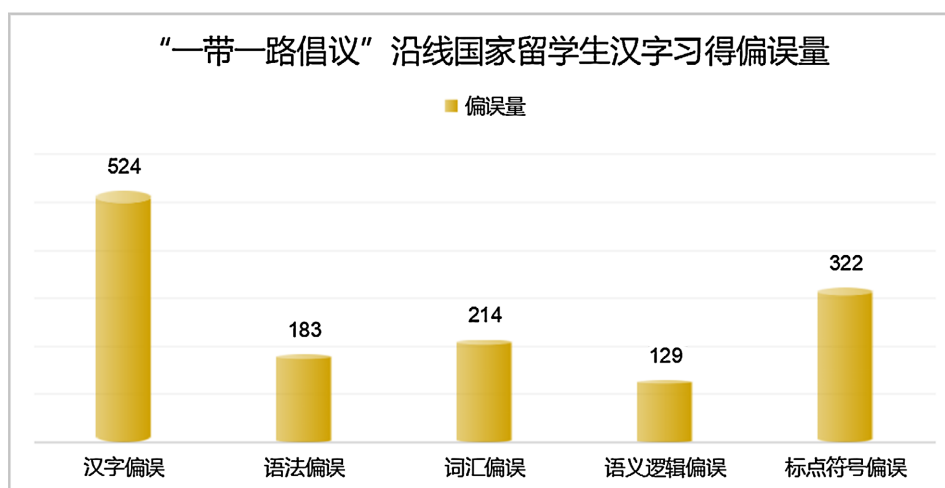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cquisition

图 1. 汉字习得偏误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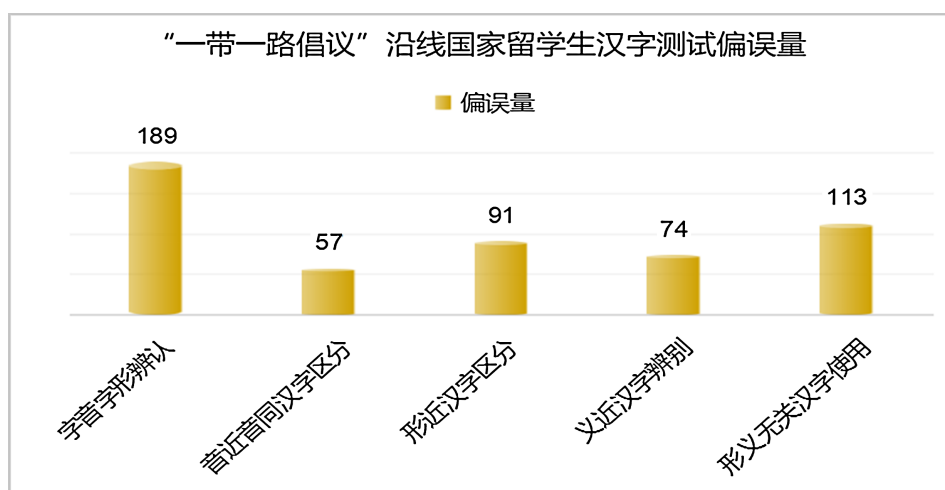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error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test

图 2. 汉字测试偏误情况

占汉字总偏误量的 21.57%；在形近汉字区分方面，留学生同样存在偏误，共出现偏误 91 例，占汉字总偏误量的 17.37%；针对留学生而言，义近汉字辨别和音近音同汉字区分偏误率略低于其他项目，分别为 74 例和 57 例，占汉字总偏误量的 14.12%和 10.89%。

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三大要素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汉字应用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难点。留学生在汉字应用能力方面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字音字形辨认、形义无关汉字使用以及形近汉字区分等方面。首先，留学生在汉字的音形对应关系上存在较大的识别困难。此外，在汉字的选择和使用上，其容易忽视形义关系，导致误用，其形近字的辨识能力也有待提高。另外，留学生在理解汉字意义以及区分汉字读音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3.2. 汉字习得偏误类型

作为独特的文字系统，汉字“是由形音义构成的整体，缺一不可”[5]，三者共同构成了汉字的完整体系，其音、形、义三大要素的复杂性给留学生汉字习得带来了诸多挑战。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

留学生而言, 汉字系统与拼音文字系统在书写、结构、读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其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偏误。课堂观摩和“汉字应用能力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留学生汉字习得偏误主要体现在认读偏误和书写偏误两个方面。

1. 汉字认读偏误

关于汉字认读偏误, 本文对 115 名留学生汉字应用能力进行调查, 并从中筛选 44 名留学生进行为期 16 周的课堂跟踪观摩。研究结果显示, 作为“非汉字文化圈”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 其在汉字认读方面, 面临形近字混淆、音近字误读及多音字困扰的“痛点”。

(1) 形近字混淆

汉字的形、音、义三大要素中, 形与义之间的关联性尤为显著, 相比之下, 音与义之间则缺乏直接的关联。而汉字的核心笔画结构简洁明了, 仅由横、竖、撇、点、折构成, 而这些基本笔画进一步演变出的其他笔画, 其间的差别也微乎其微, 因此, 汉语“用有限的偏旁笔画组成数量庞大的汉字”[6], 不可避免会出现大量的形近字。汉语中存在大量形近字, 例如, “夭一袄”“己一已”“淹一俺”“西一酉”等, 这些字在字形上非常相似, 但读音和意义却不完全相同, 因此, 留学生在认读时容易将其混淆, 从而产生偏误, 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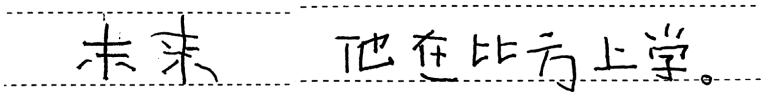


Figure 3.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forms
图 3. 形近字认读偏误

在课堂跟踪和汉字应用能力调查测试中, 近 30.69% 的留学生在认读“未—末”“比—北”两组形近字时, 均产生了偏误。“未”与“末”二字, 在字形结构上较相近, 主要差异在于其首横的长短: “未”字首横相对较长, 而“末”字首横则相对较短。这一微妙的字形区别, 对于留学生而言, 在认读时极易构成辨识障碍, 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误。例如, 可能会将“未来”(意指将来的时间或状态)误读为“末来”(一个并不存在的词汇, 易导致语义混淆), 或将“期末”(学期结束的阶段)误读为“期末”(同样为一个非标准用语, 无法准确传达原意)。同样, “比”和“北”这两个字在字形上非常相似, 只是“比”字的右边是一个竖弯钩, 而“北”字的右边是一个“匕”字。留学生在认读时很容易将其混淆, 如将“比赛”(意指比较技能的高低)误读为“北赛”(同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词汇), 或将“北方”(意指向北的方向, 特指中国黄河以北)误读为“比方”(意指把晦涩难懂的事物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

(2) 音近字误读

受语音演变和语言交融的影响, 汉字在发展变化过程中, 其语音不断演化。加之汉字的音节数量有限, 而汉语中的词汇却十分庞大, 有限的音节数量却要表达无限的词汇, 势必会出现语音相近字形、意义可能不同或相同的字, 即音近字, 例如: “音[in55]”和“英[iŋ55]”发音相似, 均为零声母的鼻音, 且声调均为阴平, 其字音的细微差别体现在“音”为前鼻音韵尾/-n/, 而“英”为后鼻音韵尾/-ŋ/, 但其字形却不完全相同, 字义更是天差地别。由于音近字在字音上存在细微差别, 留学生在认读过程中, 常因读音相近的字而受到干扰, 容易将这些音近音同字误认为是同音字, 进而产生偏误, 如图 4。

调查显示, 近 19.3% 的留学生在认读音近字“银—赢”和“升—申”过程中出现偏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银[in35]”和“赢[iŋ35]”发音相似, 均为零声母的鼻音, 且声调均为阳平, 其字音的细微差别体现在“银”为前鼻音韵尾/-n/, 而“赢”为后鼻音韵尾/-ŋ/, 但其字形和字义完全不相同, 留学生在认读时, 容易将其字音混淆, 例如, 可能会将“银奖[in35 tɕiaŋ213]”(意指比赛中的第二名)误读为“赢奖[iŋ35

tciaŋ213]”(赢得奖励)。“升[ɕʰɿŋ55]”和“申[ʃən55]”发音相似,声调均为阴平,其字音的细微差别体现在“升[ɕʰɿŋ55]”字声母为舌尖后音,韵母为后鼻音韵母,“申[ʃən55]”字声母为舌尖后音,韵母为前鼻音韵母,其字形和字义完全不相同,留学生在认读时,容易产生误读,例如,可能会将“上升[ɕʰɿŋ51 ɕʰɿŋ55]”(物体从低处到高处的移动)误读为“上申[ɕʰɿŋ51 ʃən55]”(一个并不存在的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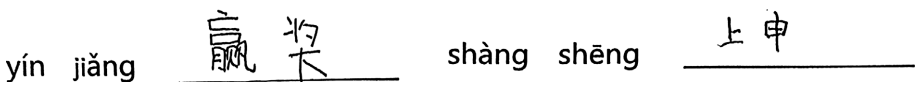


Figure 4.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sounds
图 4. 音近字认读偏误

(3) 多音字困扰

在现代汉语中多音字数量十分庞大,其形成原因也非常复杂。在现代汉语中存在文白异读的差异,例如:“血”在书面语中读作[ɕʰɿ51],而在口语中则读作[ɕʰjɛ213],这种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导致现代汉语出现了大量多音字。其次,现代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在部分汉字发音上存在差异,方言对普通话的迁移和影响,因此在现代汉语中存在方言与普通话不同发音共存的现象。此外,语音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现代汉语多音字存在“中古音与今音并存的现象”[7],从而导致现代汉语出现大量多音字。留学生在认读汉字过程中,往往容易受到汉语多音字的干扰(如图 5),例如:“行”作为汉语中典型的多音字,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发音不同,在“银行”(一种金融机构)中为[in35xɑŋ35],而在“步行”(徒步行走)中则为[pu51ɕiŋ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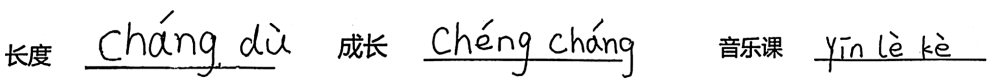


Figure 5.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polyphonic characters
图 5. 多音字认读偏误

在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的课堂追踪观察及汉字应用能力评估测试中,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46.03%的学生在认读“长”及“乐”这两个同音字时,普遍出现了认知偏差与错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长”是一个多音字,有[tʃhɑŋ35](如“长度”)和[tʃhɑŋ213](如“成长”)两个读音。留学生在认读时需要理解这个字在不同语境下的读音和意义,否则很容易产生困惑。例如,在“两条线长度不同”中,“长”应读[tʃhɑŋ35],而在“他长得很高”中,则应读[tʃhɑŋ213]。同样地,“乐”也是现代汉语常用的多音字,有[lɛ51](如“快乐”)和[qɛ51](如“音乐”)两个读音。留学生在认读时,容易将“我喜欢听音乐”中,“乐”认读为。值得注意的是,留学生对“乐”作为的读音却未产生偏误,如在表达情感时,留学生能够准确无误地认读“我今天很快乐”,这种现象主要与输入和联想相关。

2. 汉字书写偏误

针对汉字书写中出现的偏误,本研究开展了一项关于汉字应用能力的调查,涉及 115 名留学生。在此基础上,精心挑选了 44 名留学生作为重点观察对象,进行了为期 16 周的课堂教学跟踪观察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这群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而言,汉字书写方面存在显著障碍。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笔画偏误、偏旁部件偏误、笔顺偏误以及结构偏误上,这些问题构成了他们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的核心挑战。

(1) 笔画偏误

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而言,汉字笔画一直是学习的难点。通过对 115 名留学生的汉字应用能力评估测试及对 44 名留学生展开课堂跟踪,本文发现,其汉字书写笔画偏误类型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第

一类是笔画组合与复合笔画混淆；第二类是笔画增加或减少；第三类是笔画组合方式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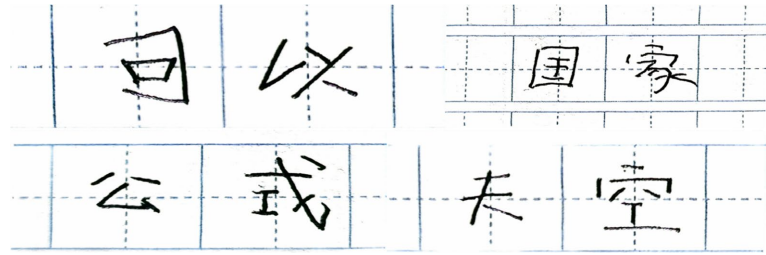


Figure 6.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strokes
图 6. 汉字书写笔画偏误

课堂跟踪和汉字应用能力调查显示(如图 6), 留学生在书写汉字“可”时, 会混淆笔画组合, 将“一”和“丿”错误地组合成“冂”。而在书写汉字“国”时, 出现笔画减少的错误, 将汉字“国”的“丶”缺失, 错误地写作“国*”²; 不同的是, 在书写汉字“式”时, 留学生出现笔画增加的错误, 额外增加了“丨”, 将“式”误写作“戎*”。在书写汉字“天”时, 部分留学生在笔画组合方式上出现偏误, 将汉字“天”中“丿”错误地出头, 写作汉字“夫”。

(2) 偏旁部件偏误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群体而言, 汉字偏旁部件的学习持续构成一项重大挑战。综合分析课堂跟踪和汉字应用能力调查结果, 本文发现该群体在汉字偏旁部件书写上出现的偏误主要包括: 一、汉字偏旁部件改换, 即错误地使用了相似的但不符合字义的偏旁部件; 二、汉字偏旁部件增减, 表现为在书写中无故增加或减少偏旁部件; 三、部件变位, 即偏旁部件在字中的位置摆放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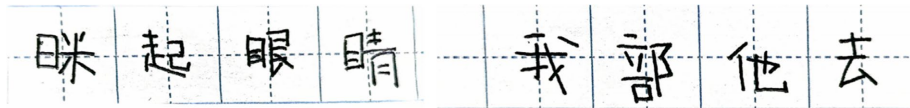


Figure 7.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radicals
图 7. 汉字书写偏旁部件偏误

如图 7 所示, 留学生在书写汉字偏旁部件时, 会改换汉字的偏旁部件, 例如, 在书写汉字“眯”时, 部分留学生将偏旁“目”改换为偏旁“日”。在书写汉字“被”时, 因形似部件混淆导致留学生出现部件减少, 将偏旁“衤”误写作偏旁“衤”; 而在书写汉字“今”时, 部分留学生会在下方错误地增加部件“丶”, 误写作汉字“令”。此外, 在书写汉字“陪”时, 部分留学生容易出现部件变位的情况, 将偏旁“阝”与部件“音”位置交换, 误写作“部”, 从而出现汉字“陪”“部”使用偏误。

(3) 笔顺偏误

对留学生这一特定学习群体而言, 汉字笔顺的学习始终是其面临的艰巨任务。课堂跟踪观察与汉字应用能力调查结果显示, 留学生在汉字书写笔顺偏误主要体现在笔顺完全错误、笔顺顺序颠倒、笔顺连接不当及笔顺简化四个方面(见图 8)。

受留学生母语书写习惯的影响, 如拉丁字母的书写往往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 与汉字笔顺规则不同。在书写汉字“女”时, 部分留学生书写笔顺完全错误, 会先写“一”, 再写“乚”, 最后写“丿”, 而正确笔顺应为先写“乚”, 再写“丿”, 最后写“一”, 形成一个封闭结构。在书写汉字“日”时, 由于对汉字笔顺规则不熟悉, 部分留学生笔顺顺序颠倒, 书写顺序为“冂”“丨”“一”“一”, 而正确笔

²注: 带“*”的汉字为该汉字的异体字或非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正确写法。

顺为“丨”“乚”“一”“一”。此外，部分留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容易忽视汉字书写的连续性，从而导致笔顺连接不当，例如，书写汉字“口”时，部分留学生会将最后一笔“一”断开，未形成封闭结构。同样地，由于对汉字笔画规则掌握不牢固，留学生在书写汉字时，还存在笔顺简化的问题，例如，书写汉字“田”时，部分留学生将原本五画的笔画简化成了四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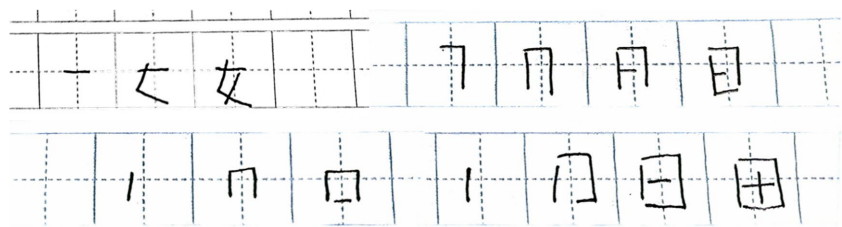


Figure 8. The errors of the Chinese stroke order
图 8. 汉字书写笔顺偏误

(4) 结构偏误

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学习中，汉字结构是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汉字本身的复杂性及母语迁移的影响，留学生难以掌握汉字的整体结构，因此在书写汉字时，容易产生结构松散不对称、部件比例失调及部件融合的偏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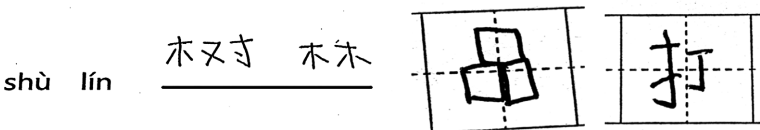


Figure 9. The structural error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图 9. 汉字书写结构偏误

从图 9 可以看出，留学生对汉字结构的整体理解不足，导致书写汉字时，出现部件间结构松散不对称的偏误，例如，汉字“树”被误写为“木又寸”。值得注意的是，留学生在书写“左右结构”的汉字时，存在部件比例失调的问题，各个部件之间的大小比例不协调，例如“打”字，左部过大而右部过小。此外，由于对汉字部件的独立性理解不足，部分留学生在书写汉字时，会将原本应该分离的部件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不清晰的形状，例如汉字“品”，正确的结构是三个“口”部件独立且等距排列，但留学生将这三个“口”部件融合成一个难以辨认的形状。

3.3. 汉字教学情况

为进一步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教学情况，本文对云南工商学院 5 名国际中文教师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结果显示，留学生汉字教学的难点集中体现在汉字认读教学、偏旁部件教学和笔顺教学三个方面。

此次受访的 5 名教师中有 2 名具备将学生从零基础逐步提升至中级水平的教学经验，当谈及留学生汉字教学难点时，两名老师的回答呈现出显著的共性，即汉字认读是其汉字教学最大的难点。其中 A 两位老师表示，在留学生汉字教学过程，其倾向于采用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思路，从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基础笔顺教学入手，随着学生识字量的逐步增加，再自然地过渡到部件教学阶段。但“非汉字文化圈”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在学汉语之前，对汉字系统非常陌生，由于其母语大多是拼音文字，排列方式较汉字相对简单，对留学生而言，其视觉习惯与母语文字系统的不同。

其次,针对留学生汉字教学难点问题,从事国际中文教学两年的F老师表示,其所教授的基本是零基础或初级阶段的学生,针对这一阶段的留学生,汉字教学最大的“痛点”在于偏旁部件教学的教学,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偏旁部件具有丰富的语义信息,且不同偏旁部件组合可以构成意义迥异的汉字,这种复杂性增加了零基础或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汉字学习的难度。

另外,C老师则表示汉字笔顺教学是留学生汉字教学的首要难题。汉字由笔画组成,而每个笔画在书写时都有其特定的顺序和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涉及笔画的先后顺序,还包括笔画之间的连接方式和整体结构的平衡。然而,对留学生来说,由于其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线性书写方式,很难适应汉字这种多维度的笔顺规则。

此外,访谈中,D老师和E老师表示,影响留学生汉字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材。二位老师认为,目前缺乏针对“非汉字文化圈”学历留学生的专门教材,现有汉字教材存在局限性,无法适应当前“中文+职业”教学背景 and 不同专业和职业教育学历留学生的学习需求。

3.4. 汉字习得偏误原因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而言,汉字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觉符号系统,其习得过程往往伴随着显著的认知重构与适应挑战,分析其偏误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归因于:汉字系统的复杂性、母语迁移的影响、学习环境和资源的限制、学习策略和方法不当四个方面。

首先,汉字作为汉语特有文字符号系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汉字的笔画种类繁多,且同一笔画在不同汉字中可能呈现不同的形态。这种笔画变形使得留学生难以准确把握每个汉字的笔画书写规则,容易导致笔画偏误。汉字的结构复杂多样,包括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等多种类型。每种结构都有其独特的书写规则和布局要求,留学生缺乏对这些结构的深入理解和练习,容易出现结构偏误。同样地,汉字的音义关系复杂多变,同一个汉字可能有多个读音和多个意义,而不同的汉字又可能具有相近或相同的读音和意义。这种复杂性使得留学生在认读和书写汉字时容易出现音近字误读、形近字混淆等偏误。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大多来自“非汉字文化圈”,其母语多为拼音文字。这种语言背景使得其在学习汉字时容易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母语迁移对其汉字习得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书写习惯的不同上,例如,拉丁字母的书写往往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而汉字的书写则有其特定的笔顺规则。这种差异导致留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容易出现笔顺偏误。此外,母语迁移的影响还体现在留学生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不足上,由于汉字结构的复杂性,留学生难以掌握汉字的整体结构,因此在书写时容易出现结构松散不对称、部件比例失调等偏误。

此外,访谈结果显示,学习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也是造成留学生汉字习得偏误的原因之一。汉字学习需要大量的练习和重复,但留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由于时间、精力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获得足够的练习机会,导致缺乏足够的汉字练习。在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示范和指导至关重要。然而,实际教学观摩显示,部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欠缺加之教学资源不足,导致留学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另外,在深入访谈中,部分国际中文教师反馈目前的汉字教材未能充分考虑当前“中文+职业”教学背景和学历留学生的学习需求,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传统的教学方法可能过于注重机械记忆和重复练习,缺乏创新性和趣味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

另外,从课堂跟踪观摩来看,大部分留学生学习汉字策略和方法的不当,忽视了汉字的音形义关系,在学习汉字时,往往容易忽视形义关系,导致误用。同时,其对形近字的辨识能力也有待提高。此外,部分留学生学习汉字时缺乏有效的学习策略,如缺乏预习、复习等环节,导致学习效果不佳。另外,部分留学生在习得汉字过程中,过度依赖翻译或母语思维,而忽视了汉字本身的特性和规律。

值得关注的是,在跟踪调查中,针对汉字学习动机和兴趣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汉字学习对留学生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其并未因为汉字学习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产生焦虑和畏难情绪,这与以往研究相比,略有出入。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学历留学生有明确的学习动机,大部分留学生表示,汉字学习是汉语学习的重要环节,学好汉字对其汉语成绩提高和职业技能培养有重要作用。

5. 汉字教学建议

长久以来,汉字教学一直是汉语教学的难点所在。汉字是音、形、义相结合的书写系统,而“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觉得‘汉字难写’是比较普遍的反映”[8]。因此,本文结合留学生汉字习得偏误以及偏误产生的原因,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从汉字意识培养、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辅助工具改善以及教学策略调整四个方面,为留学生汉字教学提出建议。

首先,汉字作为汉语的书面表达与记录工具,其独特的形体构造和音义组合方式,与字母文字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留学生汉字教学过程中培养其汉字意识尤为重要。培养留学生汉字意识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将汉字看做单纯的书写符号和词汇的附属品”[9],而是以“字”为核心展开教学活动,通过深入挖掘汉字表音与表意的双重特性,帮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汉字。

其次,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而言,汉字教学“没有考虑汉语和汉字与其他拼音文字语言及其书写系统的差异”[10],要想解决留学生汉字难学问题,传统教学模式已远远不够。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文字,其显著特点在于每个字都具有特定的音、形、义,这一特性在阅读过程中为认知加工带来了便利,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将电写汉字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如在课堂上使用电写设备进行示范和练习,同时结合板书、讲解等传统手段,有助于提高汉字教学效果,使汉语“从最难学的语言变为最好学的语言”[11]。

此外,在教学辅助工具的改善上,为改善留学生汉字感知能力弱的问题,利用 AI 技术增强汉字感知,通过 AI 分析留学生汉字学习进度和难点,为每位学生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从而确保学习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利用互动式汉字游戏,基于 AI 的互动式汉字学习游戏,如汉字拼图、汉字接龙等,以游戏化的方式增强留学生对汉字的兴趣和记忆。另外,利用电写汉字技术的实时反馈系统,帮助留学生即时纠正书写错误,加深对汉字结构的理解和记忆。

另外,受数智时代发展影响,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因此,教学策略调整也尤为关键。在留学生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强化汉字实践应用,创设汉字应用情境,如模拟购物、点餐等场景,让留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汉字。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建立汉字学习社群,让留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交流学习心得、分享学习资源。

6. 结语

在目的语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汉字教学研究不仅揭示了汉字学习的复杂性,也为对外汉字教学策略提供了启示。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和表意系统,其独特的形态结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留学生汉语学习的核心难题。对于来自“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而言,汉字学习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正如本研究所示,通过量化与实证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模式,我们能够深入探究留学生在汉字习得过程中的偏误类型及原因,从而为汉字教学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在汉字教学中,应重视培养留学生的汉字意识,使其深入理解汉字的表音与表意双重特性,充分利用目的语环境,为留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输入和练习机会,同时,还应改善教学辅助工具,调整教学策略,帮助留学生克服心理距离和情感障碍,缩小与汉语群体的社会距离,突破母语思维限制,有效提升留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促进其更好地融入汉语学习环境。

基金项目

2022 年云南工商学院校本研究课题“目的语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汉字教学个案研究——以云南工商学院为例”(项目编号: YGSXBKT2021033);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项目“少数民族杂居区家庭语言政策及母语传承研究”(项目编号: 19XJA740007)。

参考文献

- [1] 李泉. 关于“汉字难学”问题的思考[J].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2013(1): 93-109, 219-220.
- [2] 李大遂. 对外汉字教学发展与研究概述[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4(2): 41-48.
- [3] 李大遂. 对外汉字教学的“道”与“术”[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7(4): 40-46, 72.
- [4] 黄卓明. 从“图式”理论角度谈留学生的汉字学习问题[J]. 汉语学习, 2000(3): 57-60.
- [5] 刘丹青. 汉字形音义, 其音为何?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4, 9(2): 1.
- [6] 张浩宇.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形近字教学[J]. 汉字文化, 2020(4): 56-57.
- [7] 卢偃. 现代汉语常用字中多音字的分类与识别[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12): 128-132.
- [8] 陆俭明. 从汉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差异试议智能时代的汉语教学[J]. 语言战略研究, 2024, 9(5): 87-91.
- [9] 戴竹君, 武晓平. 试论汉语国际教学中汉字意识的培养[J]. 语言文字应用, 2014(1): 128-135.
- [10] 赵金铭. 初级汉语教学的有效途径——“先语后文”辩证[J]. 世界汉语教学, 2011, 25(3): 376-387.
- [11] 石锋, 及转转. 电写汉字是信息时代的大势所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4): 6-11.